

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古代儒家文化的相通性

杨凡

(天津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 尽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论范畴和时代名义,但旧邦新造、其命维新本就是儒家思想内生自化、传承不息的精神义理。对此,文章提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相通性命题。其原因在于,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一以贯之的精神风貌,以及诚意诚一的精神追求。依此三个维度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六十年”同中华民族的“那五千年”对接起来,以期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挖掘出更具历史纵深意义的文明背景。

[关键词]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 一脉相承; 旧邦新造; 其命维新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1-0039-04

时下,各种读经热、国学论充斥着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探讨。一时间,“儒家政制”受到热捧,“儒家宪政”引来热议,甚至还有人提出要“重建儒教”。面对扑面而来的“传统热”、“儒家热”、“国学热”,不得不反思的是,即使是从孔夫子“删诗书,订礼乐,以为天下教”算起,作为宏门正学的儒家学说少说也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期间的分离、流变,以及融合、整合更是起起落落、反反复复,谁能对其“一言以蔽之”?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儒家”是自我标榜出来的吗?

曾经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关系,绝不是草率的理论结合问题,也绝不是一般性的学术对话问题,更不是粗略的文本比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拨云见体’,拨开种种枝节,直指根本,要直接指向当代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需要。”^[1]以上观点引发我对儒家义理的历史性和延续性思考,基于儒家义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基本精神层面上的相通性,我坚信:当代中国所倡导的先进文化同古代儒家文化之间有着同出而异名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 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

儒家的真精神是什么?或者说,儒家有没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这几乎是每一位研究儒家学说的人都必须予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实际上有两个标准,即自强自立和进取不息。也就是说,一位优秀的人物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品质。在此,我尤其要强调“进取不息”这后一种品质。因为,按照儒家“推己及人”的人伦秩序,个人生命的进取不息实际上可以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圣次第,推导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旧伦理,进而揭示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发展规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儒家义理当中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那就是生生不息、不舍昼夜的实践精神。与此同时,“其命维新”不仅明确指出一切固步自封都与“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存在根本的背离,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维新的对象。命者“命名”,中国哲学当中的“名”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就政治统治而言,以自己的统治逻辑来推行自己的统治目的,是为命制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的另一位思想家韩愈,以及他的学说对于近现代中国政治的特殊影响。

我们知道,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一直以所谓中国道统的继任者自居,特别是退处台湾以后,更尊奉儒家的“道统论”为其立党“复国”、拒绝人民政府的核心理论。比如陈立夫就曾在《中国道统》里辩说,蒋介石论三民主义,其中心思想就是中国的道统。并引述其在《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文》中的观点,即三民主义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及孔孟思想的阐扬,因之是对中国道统的承继,也因此成为与古之道

[收稿日期] 2015-1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法治体系建设研究”资助(编号:14ZDC024)

[作者简介] 杨凡(1982-),男,湖南益阳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

统论一样的中国政治伦理和哲学的基础。其所谓的历史依据,是1921年孙中山先生曾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一段对话。是时,马林问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中山先生对答以中国的道统精神。对于“三民主义儒学化”的这段历史,近年已有学者对其作出深刻评价,其论以为,“三民主义儒学化暴露出明显的伦理色彩、狭隘视野、精英观念、偏安倾向,最终难脱失败的结局”^[2]。

应该说,道统的真正延续不该,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些个人,而应该是最为广大的多数的人;道统的生命力也不应仅仅存在于某些个体的生命当中,而应该根植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处。道统不是“铁桶”,更不是随意操之己手以为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模范不是“模具”,更不是看死几个圣人便可作自我标榜的泥胎偶像。道统从来不是某位或某些圣贤的家事。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去攀孔老夫子的亲戚,却始终能以实事求是的言行“直道而行”于人民的事业,就其精神气质而言,实与孔门坦坦荡荡的“直道精神”一脉相承。

二 一以贯之的精神风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抚今追昔,我们更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这个意思是说,尽管周朝是一个继承了以往国家主权、领土、人民与文化传统的旧邦,但它有它自己新的使命、新的命制(制度)、新的命名,以及新的治国理念和治国逻辑。

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以人文品格与人间秩序的塑造为文化极则的文明形态。它强调文以人传又人以文传,强调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国家精神与民族品性。诚如学者所论,中国人“重人伦,重情分,泛爱众,追求一个‘天下归仁’的仁爱世界。”而源于人性的仁性,又不同于人性,“仁性是经教化而得到升华的人性,既源于普世的爱,更是最高的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仁为本’”^[3]。一以贯之之下,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号召新中国的人民,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脉相承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特别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其中。这其实都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扬。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建设,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是为“前后30年”。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开创到探索,从探索到日渐成熟,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彼此指导思想不同、政策方针各异、具体工作有别,但两者绝对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30年”也是绝对不能割裂开来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4]

其实,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历史的巨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着一件相同的事业。那就是如何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独立自主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邓小平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局面。那么,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个什么关系?“这六十年”和“那一百年”,乃至与“那五千年”又是个什么关系?过去有学者也曾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甘阳教授出版的专著《通三统》主要从社会经济角度的角度论证了第一个问题。他引用了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学者的经济分析数据,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照搬照抄苏联,搞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搞深度倾斜的工业化国家,那就不可能为邓小平主政之下的中国保留下充满活力的底层经济自由体,比如为数庞大的乡镇企业^{[5]23-38}。

改革开放是松绑放权。但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些乡镇企业和其他自由经济组织体,那试问改革开放又要松哪个绑?放谁的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众多的乡镇企业和底层民营企业激活了行业的竞争,行业的竞争又引导了整个经济结构和格局的转变,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的转变又最终撬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只可惜其论述还不够深入,用的也是西方的材料,只能算是“西体中用”的一次当代学术尝试。而说是说“通三统”,实际上,“这六十年”和“那五千年”之间的关系并未深谈,只在开篇引《春秋·公羊传》里边的“三世说”笼统套了个大概^{[5]1-6}。至于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文明核心则并未涉及。

三 诚意诚一的精神追求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个中华文明的道统,中华文明的道统也从未在中国大陆丢失过。诚如上文所引陈来教授的话,对待中华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统一性,我们需要透过现象而直达本质,需要拨开云雾而直见本真。那么道统的精神何在?说一千道一万,所谓天理和人心都无非是要人永远保持那份最朴实的情感,尤其是要永远保持那份对人的最朴实的情感。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同韩愈道统论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

那么,我们这个以文化立国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究竟有着怎样一种文化的气质和文化的追求呢?孔子讲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也就是说,对一种理想人格的塑造应该坚持“文”和“质”两条腿走路。而理想的文艺作品则既要有纹饰般的华美,更要饱含对生活、对生命、对人民深厚质朴的情谊,如《礼记》里讲的“永葆赤子”,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永远不要丢掉人之为人的质朴本色。孔子又讲,“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语·子路)意思是一个立志为国为民的士子应该首先打开自己的胸襟气宇和眼界格局再去研习那些纸面上的文艺作品。更要把自己那份诚心诚意的赤子之心保留给广大劳苦人民。

由此检视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不得不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着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间那心气相通的对应性;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那思接千载的传承性;不得不说“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根本原则和方向”有着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间那义理相同的关联性。可以肯定,“文风与世风息息相关。历史上文风的变革多深刻反映和影响了社会的变革。比如古文运动扫除华丽辞藻堆砌的骈文与儒学道统的复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与民主和科学思维的大众化,20世纪80年代激进空洞的文风转变为讨论的、务实的文风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6]

纵观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风的态度,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而他自己,虽然也在青年时期写过诸如《祭黄帝陵》一类的好古文,也有大量古韵诗词传之后世,但终其一生,实际上都是在推动近代文言文运动进一步现代化、民族化、通俗化、平实化。是从文化的角度推动传统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彻底转化。

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就没有采用历

代祭祀或纪事的标准文体,而是以简洁有力又直接确定的文字写就: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看看这个“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还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正是这三个简简单单的排比,就已经替沉睡于地下的无数仁人志士道出了他们内心深处那份刻骨铭心的追求和惊天地、泣鬼神的坚守。

邓小平曾经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7]。人民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就好比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江泽民强调,“作家艺术家更应该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8]。胡锦涛认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9]。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这可以说是对当下文艺创作原则与方向的再次强调。

四 结 语

“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政者,必也正名乎。”^①“名存实亡”之间,旧邦获得新造。中国,“旧邦”无疑;但它的使命、命制又总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说,“特色社会主义”的“命制”又是“新命”的代表。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以仁爱亲民为最高文化精神的人文国家,那么今日中国则是以“以人为本”为根本价值诉求的现代国家。也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精神维度来理解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一,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精神要义的文明形态;其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传统儒家文明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不需要,也不应该另起一个“名为”儒家的炉灶。任何扛牌子、打旗帜的“复古”,骨子里仍旧是一种“文化革命”的思维方式。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

践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不是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10]只有这样来看待整个中国的大历史,我们才能解释清楚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既辩证又统一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来宏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才能将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那个渊源流长的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和人文的双重维度上真正衔接起来。

注释:

① 语出《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参考文献]

- [1] 陈来.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N]. 光明日报, 2012-04-09(15).
 [2] 鹿虎. 三民主义儒学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于

思想史的比较及其实现路径的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2):198-204.

- [3] 高德步. 论中国价值传统的转化与价值体系的重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3):122-131.
 [4] 李慎明. 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J]. 红旗文稿, 2013(9):18-21, 1.
 [5] 甘阳. 通三统[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6] 梁衡. 文风四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1.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211.
 [8]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28.
 [9] 胡锦涛. 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6-11-11(01).
 [10] 杨耕. 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J].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4):5-22, 157.

The contemporary advanced culture with the phase connectivity of ancient Confucian culture

YANG F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ism have different theory and name, the old state new creation, its vitality since Confucianism is endogenous, inheriting the restless spirit connotations. Contemporary Chinese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ancient Confucian culture is interlink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spirit temperament, style and spirit pursuit. On this basis, we can conne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60 years” with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a. It would unearth more historical culture background to enrich and develop advanced culture of China.

Key words: the contemporary advanced culture; the ancient Confucian culture;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old state new creation; the new historical mission